

卡夫卡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解析 ——以《中国长城建造时》为例

张熔煊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DOI:10.61369/HASS.2025050024

摘 要：《中国长城建造时》塑造了一个秩序井然、阶级分明的中国形象。帝国里有最高权力者皇帝、处事圆滑的官员大臣们以及质朴愚昧的普通百姓，“皇帝—大臣—百姓”的组合是促使帝国政体顺利运作的零件。本文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是卡夫卡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想象和剖析，还投射出了现实中奥匈帝国的摇摇欲坠和卡夫卡内心的焦灼。

关 键 词：卡夫卡；中国形象；想象；权力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Kafka's Novels —Tak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s an Example

Zhang Rongxuan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Abstrac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portrays an image of the orderly and class-distinct Chinese Empire. In the empire, there were the supreme ruler, the emperor, smooth-dealing officials and ministers, as well as simple and ignorant common people. The combination of "emperor – minister – common people" was the component that facilitated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imperial political system. The Chinese Empire under the feudal imperial rule in this article is not only Kafka's imag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Empire,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ecarious Austro-Hungarian Empire in reality and Kafka's inner anxiety.

Keywords： Kafka; the image of China; imagination; power

引言

卡夫卡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开头以第一人称“我”诉说了建造万里长城的事实，创造了一个沉迷修建长城的中国。卡夫卡选取“万里长城”这一最为西方家喻户晓的意象讲述中国，用长城的修建串联起中国的权力全系，显示出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权力阶层；同时，他将视线转下，关注到传达中心命令的中高级大臣和顺从质朴的民众。围绕修建长城描述了皇帝命令的宣布、官员传达命令的慌乱以及普通民众对命令的默许，皇帝的命令被传达速度之快体现出中国高度紧密的中央集权和皇权至上。但在象征权力的圣旨下放到整个帝国的过程中，由于时间、距离的因素，圣旨中的讯息失去了时效性和权威性。皇城脚下的民众已经收获了果实，而青藏高原附近的村子还在等待播种的时节，民众虽然必须无条件服从圣旨的命令，但圣旨的不断被迫“延异”也让民众与权力中心产生断裂，中央集权的高效仅仅在权力中心周围实现，在距离皇权较远的地方实际上充满了对皇帝的好奇与不理解，导致自下而上地拉低效率与破坏团结。

一、想象：中国封建权力运行的荒谬

卡夫卡从未到过中国，当1917年的多瑙河帝国濒临崩溃时，卡夫卡想起了只“活”在典著书籍中的同样疲惫不堪的中国。小说虚构的中国内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各阶级各司其职，看似稳定井然的帝国却是“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皇帝以为掌握一切，但临终前最后的谕旨却怎么也送不到宫墙之外；首领大臣以为自己每天“心头翻江倒海、忧虑重重”，却不想自己的胸脯根本撑不起帝国的重任。处于帝国权力运行机制的每一层都居庙堂太高

却不知江湖之远，包括皇帝在内的领导阶层都认为自己的命令完全有效、符合帝国实际，实则只是在自我欺骗，他们不知道从京城发出的谕旨最终被当成过时的新闻被百姓随意撕毁，命令根本无法凝聚民众对领导阶层的向心力，形成了空洞的权力中心与愚蠢的权力附庸。

（一）空洞和虚无的权力中心

作为帝国的核心，皇帝无疑是整座帝国运行的强力驱使着：皇帝是最高智慧的象征，皇帝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皇命不允许质疑抵抗。皇帝一发令，众人就心惊。当“分段而筑”长城的命

令出现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僚层紧张了，思考怎么把皇帝的命令依次传达下去，试图与皇帝一同感受工程进展带来的精神振奋；全国百姓也恭敬了，以能修建长城为荣，为国家的强大而自豪。从政治角度讲，皇帝是维护帝制统治必须的角色，用一人之令短时间内凝聚起全民族的意志，是一个称职的帝国首领。

但皇帝也不过是个符号，代表所谓权力的至高点 and 万人敬仰的头衔。皇帝只不过是领导阶层整体操纵的棋子，仅仅是命令的载体和权力的象征。建造长城的命令看似是由皇帝下令，实际上建造长城的决定在领导阶层出现时就定下了，不为了抵御面目狰狞的北方民族而颁布，皇帝只是命令的发牌手，这时皇帝就显得无辜又可伶了。皇帝被真正下达修建长城的“领导者”困于专为他设立的壳子里，被迫认领皇权的头衔，被替换成了帝国的领导工具。皇帝被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神秘的光环中，成为“孤独的男人”^[1]和“无罪的囚犯”。

高度集中的皇权压抑了皇帝的人性，皇帝能戴着“皇帝”的帽子，严格规训自己的行为，被迫接受权力的洗礼，他是被权力选中的“幸运儿”和君权的代表。皇帝享受臣仆的服务与顺从，却也相应地受到臣仆的监视：“皇帝周围总是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仆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奸险的用心，他们抵制君权，总是设法用毒箭把皇帝从轿舆上射下来”。^[2]因此，高高在上的皇帝每日也会战战兢兢、担惊受怕，既要等待着下一个命令的发布最佳时机，又要处在监视与威胁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二）瘫痪和低效的官僚系统

官僚系统中的各级官员是链接皇帝与民众的重要桥梁，皇帝等待他们传达命令、反映民众的建议，民众渴望官员带来皇帝关切的谕旨，事实上权力的链条早已生锈。高度集权的帝国让官员不再是百姓的“父母官”，他们变成了只会上传下达的工具，他们是帝国权力链条中大大小小的锈烂零件，是帝国皇权试炼炉中焚烧殆尽的碎屑。

修建长城的命令从北方传到南方，让远在南方的人民也为北方民族对帝国可能的威胁而瑟瑟发抖。传达长城征役命令的官员不会看见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不会懂得民众卑微可怜的生活，只会在民众无奈祈祷时暗自发笑，这时官员不像官员，倒像协同统治者一起压迫剥削的魔鬼。

高级官吏更是权力链条中最易被腐蚀的部分，他们冠冕堂皇地声称是封建帝制和高贵君主的坚定维护者：他们以侍仆和友人的身份围在皇帝身边监视皇帝，将皇帝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他们戴着“忠君”的帽子却随时准备将九五之尊颠覆，他们虚伪地崇拜着皇帝，内心却巴不得皇帝倒台。同时，这些色厉内荏的高级官吏还打心眼里瞧不起普通民众，每日心血来潮召开会议通过毫无用处的决议，劳民伤财的目的仅仅是欢庆并不存在的神明。今天的命令第二天就被废止，不仅让代表权威的政府命令失去效力，还逐渐失去民心，骄弛不羁的官员们让民众与帝国政府之间产生断裂。官员将民众越推越远，推至帝国不知晓的地方，使民众心中没有一个实体的政府状态，好似帝国忘记了民众，民众也不归属于帝国，这是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的失职。

官员们玩忽职守、欺下瞒上的态度，使皇帝以为自己被权力裹挟无法深入民众，民众以为龙椅之上的皇帝早已忘记自己，恪勤匪懈的皇帝和质朴单纯的民众永远也等不来自己想要的消息。信息的双向阻滞，让权力运行逐渐陷入瘫痪。遥远地方的民众总是想方设法打听皇帝或国家的某种情况，不仅附近的村庄打听不到，从行走万里的香客和艚公那里也几乎打听不到。于是，当“一生只能遇到一次”的钦差大臣终于来代表当权者宣读命令时，民众心里也只有模糊的皇帝印象，但对于面前这位官老爷却是弯下腰不敢得罪。皇帝的身份权威减弱，反而使官员自己在民众心中树立起“乡村老爷”的形象。

二、形象：顺从单纯的中国人

小说主要围绕长城的修建展开，修建长城的人也成为了卡夫卡主要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对工程殚精竭虑的泥水匠、只管拿工资的民工、辛勤劳作的基层领班。不管是民工、泥水匠还是各级领班，没有人关心他们内心是否真的想修建长城，是否真的以长城为荣，他们只是工程中必须动用的“建筑智慧”的一环。他们平静的生活被一道道圣旨、谕令打破，于是他们东奔西走，为国家荣誉和同胞希冀劳作，甚至付出生命。他们是被皇权驱使的工具人，即使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皇帝。

皇帝与百姓是割裂开的，是被迫“延异”的关系。从那个传令官身上也可以看出：皇帝命令传令官传递他的谕旨，使者立刻出发。尽管传令官是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走出皇宫。因为人口是那样众多，家屋无止无休，挡住他去路的有数不清的内宫、庭院，庭院后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冲出最外边的大门，面临的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等他把谕旨带到边关，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了。^[3]

中国人被高度集中的皇权“训练”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所有的思想必须与国家发展未来有关，所有人必须对国家工程充满自信。长城需要修建，民众就要被迫接受全国性的建筑技术教育，小孩也要从小学习砌墙；为了基层领班不丧失建造热情，领导层制定了“分段修建”的方法。统治者将国家的重任逐一分散在众人肩上，时代的尘埃让每个中国人都无比沉重，但是看着如此富庶辽阔的国家，中国人必须将沉重化为荣誉，为国家不断牺牲自我，尽管身心被压制却乐在其中。

辜鸿铭在1915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gentle）”^[4]，中国人的深沉、博大、淳朴，还有灵敏，给人以温良的感觉，其实是被模糊化的帝国制度“驯化”而形成的性格。“温良”只是表象，“顺从”才是中国人骨子里携带的刻板性格，帝制统治造成的不让表达、不会表达、不想表达，所以逐渐不表达、不发声也不思考，只需要听从上头的命令——修建长城，不仅能补贴家用，还能光耀门楣，何乐而不为呢？骄傲的帝国统治者不允许下面人过度思考他们的命令，就连最优秀的人都要遵守一个秘密的原则

“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进行思考”^[2]，不同阶层之间不流通，民众不知统治者的意图，统治者也不懂民众的真正需求，两方相互妥协，互不理解。

三、投射：奥匈帝国的现实困境和卡夫卡的精神困境

（一）奥匈帝国的崩溃镜像

卡夫卡对中国的想象和解构能看到奥匈帝国的影子，中国是卡夫卡对理想帝国的想象。他将对团结、凝聚力的渴望投射于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建造长城时充满热血，团结一致的精神鼓舞着每一个人，建造者以能够在长城上放下一块石头为荣，在家乡赋闲的人也会为祖国的伟大工程诚恳祈祷。中国人秉持“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让修建长城的热血奔腾在广阔的祖国大地上。与之相反的是奥匈帝国，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复杂政体，民族间分裂矛盾不断，帝国的统治难以维持，尤其是各民族争取独立时，让身为犹太身份的卡夫卡感到强烈的“异乡感”：他说着德语却是个犹太人，犹太裔的身份在捷克人中格格不入。卡夫卡渴望犹太人团结起来，渴望帝国人民的尊重与接纳，但事实并非如此。奥匈帝国内不同民族的人互相仇视，尤其是欧洲逐渐盛行的“反犹主义”让犹太人更加感觉失去家园、失去保护，卡夫卡感觉到一直以来的居住地仍然视他为“外来者”，无法被彻底接纳与保护。

（二）父权阴影的精神剖析

正如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5]卡夫卡选择对中国封建帝制进行解析，也来自于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像发号施令的皇帝与顺从温和的臣子，其父对卡夫卡的文学热爱没有一点儿理解，这使得卡夫卡更加沉默寡言，继续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中国人将皇帝当父亲，卡夫卡将自己的父亲当皇帝，但就像中国人大胆想象皇帝的真面目^[6-8]，试图得知这位知民爱民的皇帝真实的内心世界一样，卡夫卡也曾向父亲写过一封长达一百页的书信，诉说他对父亲的崇拜与倾慕，虽然最终信没有寄出，但也能看出卡夫卡对中国封建帝制的剖析与他的“父权”家庭紧密相关。

四、结束语

卡夫卡在伟大的长城建筑城墙内想象了一个精神理想的国度，人民充满团结与希望，皇帝拥有无上荣耀，然而墙内和平四溢，卡夫卡所在的墙外却痛苦弥漫。卡夫卡想象的“修建长城的国家”不仅是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文化中自我的投射，更是卡夫卡自身精神危机的深刻外化与自我描摹。卡夫卡对整个奥匈帝国的境遇感到痛苦，对父亲的控制感到失望，只能通过书写虚构的中国发泄痛苦、宽慰自己，这或许也是卡夫卡表达其寂寞脆弱的内心世界与现实困境的独特方式^[9,10]。

参考文献

- [1] 张德明. 卡夫卡的中国想象——解读《中国长城建造时》[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22(02): 15-20.
- [2] 叶廷芳. 卡夫卡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01.
- [3] 张德明. 卡夫卡的空间意识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04): 138-144.
- [4] 张伶俐. 论辜鸿铭及其中西文化观 [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07, (03): 17-19.
- [5] 李澜. 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形象”[J]. 文学教育(上), 2019, (05): 52-54. DOI: 10.16692/j.cnki.wxjys.2019.05.023.
- [6] 周宁. 异想天开 西洋镜里看中国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06.
- [7] 夏可君. 无用的文学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07.
- [8] 乐黛云, 曾艳兵.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2.
- [9] 残雪. 灵魂的城堡 理解卡夫卡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09.
- [10] 张莉.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08.